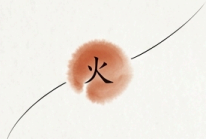


二十四节气之立夏深入解读

二十四节气之立夏深入解读

本文深入解读立夏，从先秦儒道哲学、文字本义及天文观测等维度，揭示万物由“生”转“长”的关键节点，领略先民“敬授民时”的智慧与天人合一的古老宇宙观。



玄机编辑部

本文深入解读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从先秦儒道哲学、文字本义及天文观测等维度，揭示立夏作为万物由“生”转“长”关键节点的深刻意涵。通过剖析“夏”字演变与大火星运行，带您领略先民“敬授民时”的智慧与天人合一的古老宇宙观。

玄机编辑部 · 2026-05-06

[立夏](#) [二十四节气](#) [传统文化](#) [先秦哲学](#) [天文历法](#)

目 录

引言：为何要重新凝视"立夏"？

第一章 "夏"之本义：一个字的宇宙

- 一、"夏"字何以谓"夏"？
- 二、"大"之哲学：从万物的生长说起
- 三、为什么"夏"又与"华"相通？

第二章 立夏的天文基础：先民如何知道夏天来了？

- 一、日影与圭表：最古老的天文仪器
- 二、星宿与立夏：仰观天象的智慧
- 三、从"二分二至"到"四立"：节气体系的扩展

第三章 《礼记·月令》中的孟夏之月：一幅完整的宇宙图景

- 一、月令的性质：天人之间的行动指南
- 二、为什么月令要构建如此精密的对应体系？
- 三、孟夏之月的天子行事：政治即天文
- 四、孟夏之月的政令：顺时而治
- 五、月令的警告：行不时之令的后果

第四章 儒家视角：立夏与仁德之长

- 一、仁之生发：从春到夏的德性转换
- 二、孔子先生的"时"之教诲
- 三、礼与夏：为什么夏天对应礼？
- 四、"己欲立而立人"：立夏中的仁学深义
- 五、曾子先生的"日三省吾身"与夏之修养

第五章 道家视角：立夏与道之"长"

- 一、道的四季：生长收藏
- 二、庄子先生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 三、"道法自然"与立夏之气
- 四、庄子先生论"物化"与夏之变
- 五、"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第六章 上古神话中的夏：火神、南方与炎帝

- 一、炎帝与火德：夏之帝的神话渊源
- 二、祝融：火神的多重面相
- 三、南方之谜：为什么夏天与南方相配？
- 四、共工与祝融之战：水火之争的宇宙叙事
- 五、日与夏：太阳崇拜的投影

第七章 《周易》与立夏：乾坤消长的关键节点

- 一、乾卦与夏之阳
- 二、乾卦六爻与夏之进程
- 三、《周易·系辞》论"变"与立夏之变
- 四、离卦与夏之象

第八章 立夏的物候世界：万物如何"知道"夏天来了？

- 一、物候的哲学意义
- 二、"蝼蝈鸣"：声音中的宇宙
- 三、"蚯蚓出"：大地的呼吸
- 四、"王瓜生"：生长的具象化

第九章 阴阳五行与立夏：一套完整的宇宙语法

- 一、阴阳消长：立夏处于何处？

二、五行之火：不仅仅是炎热
三、五行相生：木生火与春夏之交
四、五行相克：火克金的深意
五、为什么先民如此执着于五行对应？
第十章 立夏与农耕：大地之上的人事
一、“不违农时”：孟子的农政智慧
二、《诗经》中的夏日农事
三、水利与立夏：夏天的水为什么特别重要？
四、“使民以时”：孔子的政治伦理
第十一章 立夏与身心修养：先秦的“夏季养生”之道
一、“养长”之道：夏天的身心状态
二、老子的“清静”与夏之养
三、庄子的“心斋”与“坐忘”
四、身体与季节：先秦的身体观
第十二章 立夏之礼：迎夏仪式的深层结构
一、迎夏于南郊：仪式的空间结构
二、赤色之礼：以色配德
三、行赏封侯：政治仪式的宇宙意义
四、祭灶之礼：火与日常生活的联结
第十三章 《楚辞》中的夏：南方的诗性与幽情
一、屈子笔下的夏之草木
二、《九歌》与夏之神灵
三、屈子的“哀时”：当季节成为悲伤的隐喻
第十四章 “为什么”的追问：立夏的哲学疑难
一、为什么天地之气会有“转折”？
二、为什么人需要“迎夏”？
三、为什么四季是四而不是三或五？
四、为什么立夏的物候是“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而不是别的？
五、为什么先秦人如此热衷于建立“对应关系”？
第十五章 《山海经》中的南方世界：立夏的神话地理
一、南方的神灵与异兽
二、火山与火泉：大地之火
三、扶桑与十日：太阳神话与夏之光
第十六章 立夏与音乐：蕤宾之律与天地之声
一、十二律与十二月
二、为什么音乐与季节有关？
三、音乐作为天人沟通的媒介
第十七章 立夏与水：看似矛盾的共生
一、夏天为什么多雨？
二、雷雨与夏之威
结语：立夏之门——走入天人交融的世界
一、回顾：我们学到了什么？
二、立夏之门：一个隐喻
三、最后的追问：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理解立夏？

二十四节气之立夏深入解读

引言：为何要重新凝视"立夏"？

天地之间，万物有时。当我们今日谈及"立夏"，往往只将其视为日历上的一个标记——某月某日，夏天来了。然而，这样的理解，实在辜负了先民数千年仰观俯察之功。立夏，绝非一个简单的时间节点，它是先民对天道运行之深刻体认的凝结，是人与自然之间那条古老而幽微的纽带之明证。

为什么要从先秦与上古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立夏？因为那是这个节气诞生的时代，是它的意义尚未被后世层层叠叠的注疏所遮蔽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节气不是知识，而是生存；不是概念，而是信仰；不是文化符号，而是天人之间真实而庄严的交往。

《尚书·尧典》有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短短数语，道尽了节气诞生的根本缘由——"敬授民时"。一个"敬"字，一个"授"字，将天文观测提升到了近乎宗教的高度。观天不是为了满足好奇，而是为了"敬"——对天道的敬畏；授时不是为了方便生活，而是为了"授"——将天的意志传达给人间。这里面蕴含着怎样深沉的宇宙观？为什么先民认为时间是需要被"授予"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

这个问题，恰恰触及了先秦思想的核心。在先民看来，时间并非均质流淌的河流，而是有节奏、有韵律、有品质差异的。春之时与夏之时，不仅温度不同，其"气"不同，其"德"不同，其所宜之事亦不同。立夏，正是这种时间品质发生根本性转换的那个关键节点。

《周易·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所谓"与四时合其序"，便意味着人的行为、情感乃至心灵状态，都应当随着四时的更迭而做出相应的调整。立夏，便是由春之"生"转入夏之"长"的那道门槛。跨过这道门槛，天地万物的运行法则便悄然改变了。

本文将从先秦儒道两家的核心思想出发，并上溯至更为古远的神话与民俗传统，对"立夏"这一节气进行一次尽可能深入的解读。我们不仅要知道立夏是什么，更要追问它为什么是这样；不仅要了解古人在立夏做什么，更要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个追问的过程中，或许我们能重新触摸到那个万物有灵、天人相感的古老世界。

第一章 "夏"之本义：一个字的宇宙

一、"夏"字何以为"夏"？

在进入立夏的具体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凝视"夏"这个字本身。为什么用"夏"来命名一年中最热烈、最蓬勃的季节？这个字的本义究竟是什么？

"夏"字的甲骨文字形，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种广为接受的解释认为，其字形像一个人，头部、手臂、躯干、双腿俱全，是一个"大人"的形象。这与"大"字有密切的关联。事实上，在先秦文献中，"夏"常与"大"互训。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虽然这句话的具体出处涉及后世文献，但其所反映的"夏"与"大"相通观念，确实根植于上古。

为什么"大"能与一个季节的名称相关？这里面隐藏着先民一个极为朴素而深刻的观察：夏天，是万物"大"起来的季节。春天萌发的草木，到了夏天便枝繁叶茂、蔚然成荫；春天播下的种子，到了夏天便拔节抽穗、生长壮大。"夏"之为"大"，正是对这种蓬勃生长之力的直观命名。

《尔雅·释天》曰："夏为朱明。"朱者，赤也；明者，光也。夏天是赤红而光明的季节。这与五行学说中夏属火、其色赤的观念完全吻合。但"朱明"二字所传达的不仅是色彩，更是一种宇宙性的能量状态——天地之间，阳气充盈，光明大盛，万物在这光明中尽情生长，达至"大"的状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先民会将"大"视为一种值得专门命名的状态？

二、"大"之哲学：从万物的生长说起

在先秦哲学中，"大"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而是一个承载着深厚哲学意蕴的概念。

老子先生在《道德经》中反复论及"大"。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在老子先生看来，"大"是道的别名之一。道之所以"大"，是因为它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生生不息。

而夏天恰恰是天地之道展现其"大"的季节。春天的道是"生"——微细的、柔嫩的、刚刚萌动的；夏天的道是"长"——充沛的、壮盛的、恣意扩展的。如果说春天让我们看到了道的"始"，那么夏天就让我们看到了道的"壮"。

老子先生又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了就会流逝，流逝了就会走远，走远了就会返回。这短短十二个字，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运动。而四季的更替，不正是这个循环运动最宏大的体现吗？夏之"大"，不是终点，而是通向秋之"收"的必经之路。立夏，标志着万物开始走向"大"的旅程，但这个

旅程的终点，恰恰是“反”——返回到冬之藏、春之生，然后再一次走向夏之大。

庄子先生对“大”的理解更为恢宏。他在《逍遥游》中描绘了那只巨大无比的鲲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是何等等的“大”！而这种“大”的意义何在？庄子先生要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自由，需要足够的“大”来承载。蜩与学鸠之所以不能理解鲲鹏，不是因为它们愚蠢，而是因为它们太“小”——它们的生命格局太小，无法容纳那种宏大的自由。

将庄子先生的这个洞见运用到对四季的理解中，我们或许可以说：夏天的“大”，正是天地用以展示其自由与丰盈的方式。万物在夏天尽情生长、蓬勃扩展，这不是盲目的膨胀，而是天地之道在这个特定时段所展现的自由与充沛。

三、为什么“夏”又与“华”相通？

在上古汉语中，“夏”与“华”常常通用。华夏，既是民族之名，也是一个包含着丰富意蕴的文化概念。而从季节的角度来看，“华”即“花”，夏天正是百花盛放之后、万物华美之时。

《诗经·小雅·四月》有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四月入夏，这与后来确立的立夏时间大致吻合。而在《诗经》的世界里，夏天的景象是怎样的呢？

《诗经·邶风·七月》详细描绘了一年四季的物候与人事：“四月秀葍，五月鸣蜩。”四月里远志草开花，五月里蝉儿开始鸣叫。“葍”之秀（开花）与“蜩”之鸣（鸣叫），都是夏天来临的标志性物候。先民不是通过温度计来判断夏天的到来，而是通过这些细腻入微的自然观察。一朵花的绽放，一只蝉的鸣叫，在先民眼中都是天道运行的信号。

为什么先民如此重视这些微小的自然变化？因为在他们的宇宙观中，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局部的变化都反映着整体的动向。远志草之所以在四月开花，不是它自己“决定”的，而是天地之气运行到了这个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样，蝉之所以在五月鸣叫，也是因为阳气已经充盈到了某个临界点，激发了蝉的生命力。先民通过观察这些物候现象，来把握天地之气的运行节奏，进而安排人间的生产与生活。

这就是节气的本质——它不是人为的划分，而是天道运行的客观节点。立夏之所以被确立为一个节气，不是因为某个圣王一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因为先民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到了这个时间点，天地之间的一切——日照、温度、降水、物候——都发生了一种整体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渐变，而是某种意义上“质变”——虽然温度的变化是渐进的，但天地之“气”的转换却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节点。立夏，就是这个节点。

第二章 立夏的天文基础：先民如何知道夏天来了？

一、日影与圭表：最古老的天文仪器

先民是如何确定立夏的具体日期的？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入了中国古代天文学最核心的领域。

最基本的方法是观测日影。《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圭表，是中国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工具之一。一根垂直竖立的表（竿），加上一根水平放置的圭（尺），便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天文观测系统。通过测量正午时分表影的长短，先民可以精确地判断太阳在天空中的高度，从而确定节气。

夏至日，正午的日影最短，因为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最高。冬至日，正午的日影最长，因为太阳的位置最低。而立夏，其日影长度介于春分与夏至之间，比春分短，比夏至长。先民通过长年累月的观测和记录，逐渐掌握了日影变化的规律，从而能够提前预测各个节气的到来。

《周髀算经》（此书虽有争议，但其中包含的天文知识多源于先秦）记载了一套详细的日影观测数据，其中涉及了各个节气日影的理论长度。这些数据表明，先秦时期的天文学家已经具备了相当精确的天文观测能力。

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先民最初是如何产生“要去测量日影”这个念头的？日影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每天的差异微乎其微。是什么样的敏锐与耐心，促使先民开始了这项持续数代人的漫长观测？

答案或许就在“敬授民时”四个字中。农业生产对时间的依赖是绝对的——错过了播种的时节，就意味着一年的歉收乃至饥荒。在那个没有任何其他时间标准的年代，天文观测不是一种学术活动，而是关乎整个族群生死存亡的大事。正是这种生存的压力，驱动着先民以超乎寻常的专注和毅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观测着那根表竿投下的影子。

二、星宿与立夏：仰观天象的智慧

除了日影观测之外，先民还通过观察星宿的位置来确定节气。

《尚书·尧典》中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段话记录了四仲（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对应的标志性星宿。其中，“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告诉我们，在夏至时节，黄昏时分出现在南方天空正中的是“火”星——即心宿二（大火星，天蝎座α星）。

大火星在先秦天文学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祀大火。”远古时代，专门有“火正”这一官职来负责观测大火星的出没。大火星在春天黄昏时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之上，称为“火见”；到了夏天，它升至中天；秋天西沉，冬天则完全隐没。大火星的这个升沉周期，恰好与一年四季的更替相呼应。

而立夏，正处于大火星从东方升起、逐渐走向中天的过程之中。当先民在黄昏时分看到大火星已经升起到相当的高度——虽然尚未到达最高点（那要等到夏至）——他们便知道，夏天已经来临了。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先民会将“火”这个意象与夏天联系在一起？这仅仅是因为夏天炎热吗？

答案远不止于此。在先秦的五行体系中，夏天属火。但五行学说中的“火”，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火焰，更是一种宇宙性的能量形态——它代表着扩散、上升、炎热、光明。大火星之所以被选为夏天的标志性星宿，不仅因为它恰好在夏天最为明亮，更因为它的赤红色光芒与“火”的意象天然契合。天上的星宿、地上的季节、五行的火德，三者在先民的认知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对应系统。这不是巧合，而是先民宇宙观的核心逻辑——天地万物，一以贯之。

三、从“二分二至”到“四立”：节气体系的扩展

在最早的节气体系中，只有“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节气是最容易通过天文观测确定的：两个分点（昼夜等长）和两个至点（日影最长和最短）。

但“二分二至”只能将一年粗略地分为四段，这对于精细的农业生产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先民在“二分二至”的基础上增加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立”者，始也、建也。立夏，就是夏天的开始。

“四立”的确立，标志着先民对季节变化的认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分二至”关注的是天文现象的极值——最长、最短、相等；而“四立”关注的是季节转换的起始——从什么时候开始，天地之气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问题比前者更加微妙，因为季节的转换不像至点和分点那样有明确的天文标志，而需要综合考虑日照、温度、物候等多方面的因素。

《逸周书·时训解》对各个节气都有详细的物候描述。关于立夏，它记载：“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蝼蝈开始鸣叫、蚯蚓从泥土中钻出、王瓜开始生长——这三个物候现象，被先民视为立夏到来的标志。

为什么是这三个物候？这里面有深刻的道理。蝼蝈鸣，是声音的变化——夏天的声景与春天不同，虫鸣变得更加响亮和密集。蚯蚓出，是土壤的变化——随着气温升高，地温也随之上升，促使蚯蚓从深层土壤中活动到浅层。王瓜生，是植物的变化——某些特定的植物只在夏天才开始生长。先民通过这三个不同领域（动物行为、土壤状态、植物生长）的变化来交叉验证立夏的到来，这体现了一种朴素而严谨的实证精神。

更值得注意的是，《逸周书·时训解》还记载了物候失序的后果：“蝼蝈不鸣，是为阴慝。”“蚯蚓不出，是谓嬖夺。”“王瓜不生，困于百姓。”如果蝼蝈不鸣叫，说明阴气侵犯了阳气；如果蚯蚓不出来，说明政治上有宠幸之祸；如果王瓜不生长，百姓将遭受困苦。这些“灾异”的解释虽然在现代看来缺乏科学依据，但它们反映了先民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念：自然秩序与人事秩序是相通的。天地之气如果失调，人间也必然会出问题；反过来，人间的正义也会影响天地之气的正常运行。

这种“天人感应”的观念，是理解先秦节气文化的关键。在先民看来，观察物候不仅是预测天气和安排农事的手段，更是监测天地秩序是否正常运行的方式。立夏时节，如果三候如期而至，说明天地之道在正常运行，人间也将安宁祥和；如果三候失序，则是天地发出的警告，提醒人间需要反省和修正。

第三章 《礼记·月令》中的孟夏之月：一幅完整的宇宙图景

一、月令的性质：天人之间的行动指南

在所有先秦文献中，对立夏及其所在的孟夏之月描述最为详尽系统的，当属《礼记·月令》（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孟夏纪》高度一致，学者多认为二者同源）。月令不是简单的历法记录，而是一套完整的天人行动指南——它告诉我们，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上，气象如何、地物如何、人事当如何。

《礼记·月令》开篇便为孟夏之月勾勒了一幅完整的宇宙图景：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

这三句话分别指出了太阳、黄昏时南中天的星宿和黎明时南中天的星宿。日在毕——太阳运行到了毕宿的位置；昏翼中——黄昏时分，翼宿位于南方天空的正中；旦婺女中——黎明时分，婺女星位于南方天空的正中。这些星宿的位置，是先民判断时节的天文依据。

紧接着，月令描述了孟夏之月的五行属性：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这段话构建了一个极为精密的宇宙对应体系。让我们逐一分析：

“其日丙丁”——孟夏之月对应天干中的丙和丁。在十天干中，丙丁属火。为什么？因为十天干与五行的对应关系是：甲乙属木（春），丙丁属火（夏），戊己属土（长夏/季夏），庚辛属金（秋），壬癸属水（冬）。这套对应体系将时间（天干）与物质性质（五行）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先秦宇宙论的基本

框架之一。

"其帝炎帝"——孟夏之月的主宰之帝是炎帝。炎帝，亦即神农氏，是上古神话中的火德之帝。为什么夏天的主宰是炎帝而不是其他帝王？这与五行配五帝的体系有关：春之帝为太皞（木德），夏之帝为炎帝（火德），中央之帝为黄帝（土德），秋之帝为少皞（金德），冬之帝为颛顼（水德）。炎帝以"炎"为号，其名本身就蕴含着火的意象，与夏天的火德完美契合。

"其神祝融"——孟夏之月的佐神是祝融。祝融是上古神话中的火神，是炎帝的臣属。《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祝融以火神的身份主管南方和夏天，这与五行体系中火属南方的观念一致。

为什么需要既有"帝"又有"神"？这反映了先秦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治理需要层级分工。帝是最高的主宰者，负责确定大方向；神是具体的执行者，负责落实帝的意志。天上如此，人间亦然。天子是人间的"帝"，而百官是人间的"神"。月令通过这种天上与人间的对应，为人间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宇宙论层面的正当性。

"其虫羽"——孟夏之月的代表性动物类别是"羽虫"，即鸟类。在先秦的动物分类体系中，万物被分为五大类：鳞虫（鱼类，对应春）、羽虫（鸟类，对应夏）、裸虫（人类，对应中央）、毛虫（兽类，对应秋）、介虫（甲壳类，对应冬）。鸟类之所以与夏天对应，一方面是因为夏天鸟类活动最为活跃，鸣叫最为响亮；另一方面，鸟类飞翔于天空，具有"上升"的意象，这与火的向上运动特征相合。

"其音徵"——孟夏之月的音律是"徵"音。在五声（宫商角徵羽）中，徵音最为激昂高亢，其声质与火的热烈特征相应。先民认为，每个季节都有其特定的"声音"——不是说夏天只能听到徵音，而是说夏天天地之气的振动频率与徵音的频率相共鸣。这是一种何等奇妙而大胆的想象！它将声学宇宙论联系在一起，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一种超越物质的"共振"关系。

"其数七"——孟夏之月的象数是七。在先秦数术体系中，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七属火，故配于夏。这套数字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其来源极为古远，可能与河图洛书的传统有关。

"其味苦"——孟夏之月的味道是苦。五味（酸苦甘辛咸）与五行的对应为：酸属木（春），苦属火（夏），甘属土（长夏），辛属金（秋），咸属水（冬）。为什么苦味属火？一种解释是：苦味的药物多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而清热正是对治火之过盛。另一种更深层的解释是：火性炎上，其气干燥，干燥之极则生苦味。在先民的感知体系中，味觉不仅是舌头的感受，更是天地之气的一种表现形态。

"其臭焦"——孟夏之月的气味是焦味。焦味是物质被火烧灼后产生的气味，这与夏属火的主题直接相关。在五臭（膻焦香腥朽）中，焦味最为刺鼻，也最具有"热"的感觉，与夏天的炎热特征吻合。

"其祀灶"——孟夏之月祭祀的对象是灶神。灶，用火之处也。以火祀火，以灶祭夏，其逻辑一以贯之。灶神的祭祀，也反映了先民对"火"的生活化理解——火不仅是宇宙性的力量，更是每日每刻烹饪食物、维持生存的基本工具。通过祭祀灶神，先民将宇宙之火与生活之火、天之火德与人之用火联结在一起。

"祭先肺"——祭祀时首先献上的器官是肺。在五脏与五行的对应中，先秦有不同的说法。月令此处以肺配夏，与后世医家以心配火的说法有所不同。这反映了先秦五行配属体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但无论具体配属如何，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与宇宙的某个层面相对应，祭祀时献上特定的器官，是在表达人体与天地之间的共鸣。

二、为什么月令要构建如此精密的对应体系？

回顾以上分析，我们不禁要问：月令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篇幅来构建这个精密的宇宙对应体系？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知道"夏天来了"不就够了吗？

答案在于：对先民而言，仅仅知道"夏天来了"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知道的是——在夏天的背后，整个宇宙以怎样的方式在运行？天上的星宿、地上的万物、人身的五脏、食物的五味、声音的五音……一切是如何被同一股力量所贯穿和联结的？

这种追求"一以贯之"的冲动，是先秦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孔子先生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这个"一以贯之"不仅是伦理学的原则，更是宇宙论的信念——天地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背后有一个统一的法则在运行。月令所构建的宇宙对应体系，正是这种信念的具体表现。

更进一步说，这个对应体系不仅是认识论的，更是实践性的。它告诉统治者和民众：在不同的时节，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这不是出于实用的考量（虽然实用性也很重要），而是出于一种深层的信念——人的行为如果与天地之道不合拍，就会引发灾祸；只有让人事与天道保持同步，才能确保天下太平、风调雨顺。

三、孟夏之月的天子行事：政治即天文

月令对孟夏之月天子的行为有极为详细的规定：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天子在孟夏之月应当居住在明堂的南面偏东之处（"左个"），乘坐红色的车子（"朱路"），驾驭赤色的马（"赤骝"），插上红色的旗帜（"赤旗"），穿上红色的衣服（"朱衣"），佩戴赤色的玉器（"赤玉"），吃豆类和鸡肉（"食菽与鸡"），使用高而粗的器具（"其器高以粗"）。

为什么天子在夏天要穿红色、乘红车、驾红马？这不是审美偏好，而是宇宙论的要求——夏天属火，火之色为赤。天子作为天地之间的中介者，他的一切行为都应当与当时当令的宇宙法则保持一致。穿红色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与天地之"火德"相呼应，从而确保天人之间的和谐。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哲学观念：统治者不是凭借自己的意志来治理天下的，而是要顺应天道来治理。天子的每一个行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住在宫殿的哪个位置——都不能随心所欲，而要严格按照天道的指示来执行。这既是对统治者权力的约束（你不能为所欲为），也是对统治者权威的神圣化（你的行为代表着天道）。

"食菽与鸡"这一条也值得细究。菽即大豆，鸡属羽虫。二者都与夏天的五行属性相对应——虽然具体的对应逻辑在不同文献中有所不同，但"以类相从"的原则是一致的。天子吃什么不是个人的饮食偏好，而是一种宇宙性的行为。通过食用与当季五行属性相应的食物，天子将天地之气摄入自己的身体，从而使自己成为天地之气在人间的载体和传递者。

"其器高以粗"则与火的特性有关——火性炎上，故器物宜高；夏天万物壮盛，故器物宜粗。器物的形制不是工匠的随意设计，而是天地之道在物质层面的表现。

四、孟夏之月的政令：顺时而治

月令接着规定了孟夏之月应当施行的政令：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齐。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

这段话描述了立夏日的正式仪式。在立夏到来之前三天，太史（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要向天子报告："某日立夏，盛德在火。"——某一天就是立夏了，这个时节的主导力量（"盛德"）是火。然后天子开始斋戒，到了立夏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南郊去迎接夏天的到来。

为什么要到南郊？因为南方属火，夏天从南方而来。迎春于东郊（东方属木），迎夏于南郊（南方属火），迎秋于西郊（西方属金），迎冬于北郊（北方属水）——四时的迎接方位严格遵循五行方位的体系。

"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迎夏归来之后，天子要施行赏赐。为什么立夏时要赏赐？因为夏天是万物"长"的季节，天地之气在这个季节是扩张的、给予的、慷慨的。天子顺应天道，也应当在这个季节表现出慷慨和给予。行赏封侯，不是权术上的施恩，而是与天道合拍的政治行为。

月令还详细规定了孟夏之月不应当做的事情：

"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

"继长增高"——要顺应万物生长的趋势，让它们继续生长、增高。"毋有坏堕"——不要有任何破坏和拆毁的行为。"毋起土功"——不要兴建大型的土木工程。"毋发大众"——不要征发大批的劳役。"毋伐大树"——不要砍伐大树。

为什么这些行为在夏天是被禁止的？因为夏天是"长"的季节，天地之道在这个时节是"生长"而非"收杀"的。如果人在这个时节做出破坏、砍伐、征役等与"收杀"相关的行为，就是逆天道而行，必然会招致灾祸。

这种"顺时而治"的理念，在先秦政治哲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意味着：最好的治理不是按照统治者的主观意愿来行事，而是按照天道的客观规律来行事。天道在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要求，统治者的职责是洞察这些要求并忠实地执行它们。

五、月令的警告：行不时之令的后果

月令在描述了孟夏之月应行之事后，还严厉地警告了不当行为的后果：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如果在孟夏之月施行了秋天应行的政令（如大规模的刑罚和征收），则会导致连绵苦雨、五谷不长、四方百姓逃入城堡避难。如果施行了冬天的政令（如大兴土木、严酷的法令），则草木过早枯萎，后来还会发生大水，毁坏城墙。如果施行了春天的政令（如过度宽纵），则会有蝗灾、暴风，庄稼开花而不结果。

这些警告的逻辑基础是什么？它基于一个核心信念：每个季节都有其特定的"气"，而政令的性质也有其特定的"气"。秋天的政令是"收"的、"杀"的（如刑罚），冬天的政令是"藏"的、"闭"的（如禁闭），春天的政令是"生"的、"散"的（如大赦）。如果在夏天（"长"的季节）施行了"收"的政令，就会导致"长"与"收"两种气的冲突，从而引发气候和农业上的灾害。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种因果关系当然缺乏科学依据。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月令的这些警告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政治智慧：治理应当有其节奏。在社会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不要横征暴敛；在经济需要发展的时候，不要过度管制。虽然月令将这种政治智慧包装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中，但其核心洞见——治理需要与社会的客观需求相适应——至今仍有价值。

第四章 儒家视角：立夏与仁德之长

一、仁之生发：从春到夏的德性转换

在儒家哲学中，四时与四德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虽然这种对应在不同的文献中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基本框架是清晰的：春属仁，夏属礼，秋属义，冬属智（一说春仁夏礼秋义冬信）。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最根本的层面来思考，四季之德其实都是“仁”之一德的不同展开。孟子先生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将仁与人合在一起来理解，就是道。

仁在春天表现为“生”——万物萌生，生意盎然，这是仁的发端。而到了夏天，仁表现为“长”——万物壮大，蓬勃发展，这是仁的充实。如果说春天的仁是“恻隐之心”——那种柔软的、刚刚萌动的善意；那么夏天的仁就是“扩而充之”——将那份善意扩展、壮大，使之成为一种真实的力量。

孟子先生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这段话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比喻——“若火之始然”。仁之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如同刚刚点燃的火苗，如果能够“扩而充之”，就能燎原天下；如果不能，就连基本的孝道都做不到。

注意这个比喻：火。孟子先生用火来比喻仁的生长和扩展。而夏天正是火德当令之时。这是巧合吗？或许不是。在先秦思想家的认知中，自然的火与心灵中的仁，遵循着同样的法则——都需要从微小的“端”开始，经过不断的培养和扩展，才能达到充盈。立夏，标志着自然的阳气从春天的萌进入夏天的壮盛，同时也提醒着人们：内心的仁德也需要从萌芽走向充盈。

二、孔子先生的“时”之教诲

孔子先生对“时”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论语·阳货》记载：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说了什么话吗？四季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天说了什么话吗？这是孔子先生对天道最简洁也最深刻的表达。天不用言说，它通过四时的运行和万物的生长来展示自己的意志。而人要理解天的意志，就必须去观察四时、体会万物。

在这个意义上，立夏不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天文现象，而是天道自身的一次“表达”。当温度升高、白昼变长、虫鸣响起、草木茂盛的时候，天正在“说”——虽然它没有用语言，但它的表达比任何语言都更加明确和有力。

孔子先生被后人尊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孟子先生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先生之所以是“圣之时者”，是因为他最善于把握“时”——在不同的时机做出最恰当的反应。这种“时”的智慧，不仅是政治和伦理层面的，更是宇宙论层面的。

一个真正懂得“时”的人，在立夏来临之际，他的内心状态也应当随之发生转变。春天时，他培养内心的仁爱之种；立夏时，他让这份仁爱开始充实和壮大。这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就像花朵在春天绽放、果实在夏天生长一样自然。

三、礼与夏：为什么夏天对应礼？

在某些先秦文献的四时配四德体系中，夏天对应的德目是“礼”。这一对应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为什么是“礼”而不是其他德目？

“礼”字的本义与祭祀有关。《说文解字》虽然是后世之书，但它所记录的字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礼”的核心含义是一套有序的行为规范——什么时候做什么、怎么做、对谁做。而这种“有序”的要求，与夏天万物各得其所、蓬勃有序地生长的状态，有着深层的呼应。

春天是“生”的季节，万物刚刚萌发，还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到了夏天，万物开始各自成形、各有其位——树木向上生长，根系向下延伸，花朵朝向阳光，叶片展开以接收雨露。每一种生物都在按照自己的“礼”（特定的生长规律）来行事。这不正是“礼”的宇宙性体现吗？

孔子先生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学习礼，就无法在社会中立足。而“立夏”中的“立”字，恰好与这个“立”相呼应。立夏，是夏天“立”起来的时刻；人通过学礼也“立”起来。这种文字上的呼应或许是巧合，但它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道理：无论是自然的季节还是人的成长，“立”都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萌发到“立”，标志着从潜在到现实、从混沌到秩序的转变。

荀子先生对“礼”有最为系统的论述。他说：“礼者，天地之序也。”（约见于《荀子·礼论》近似表述）礼不是人为的发明，而是天地秩序在人间的体现。天有四时之序，地有山川之序，人有君臣之序——这些“序”都是同一个宇宙法则的不同表现。夏天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正是“礼”在自然界中的展开。

荀子先生又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道的运行有其固定的规律，不会因为圣明的帝尧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暴虐的夏桀而消亡。这句话看似与节气无关，实则揭示了节气的本质——立夏的到来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它是天道运行的客观结果。人能做的不是改变天道，而是认识天道、顺应天道。

荀子先生进一步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天有它的时节，地有它的物产，人有它的治理方式。三者各有其分，不能混淆。但三者之间又不是完全隔绝的——人的治理方式应当与天的时节和地的物产相配合。这正是月令思想的哲学基础。

四、“己欲立而立人”：立夏中的仁学深义

《论语·雍也》记载孔子先生的话：“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中的“立”与“达”两个字，如果放在四季的框架中来理解，会获得新的意义。

“立”对应的是“立”的时刻——就像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标志着四季的确立一样，人的成长也有其“立”的时刻。而“达”对应的是“长”的过程——确立之后，还需要发展、壮大、通达。立夏，正是从“立”到“达”的转折点。

仁者不仅自己要“立”、要“达”，还要帮助他人“立”和“达”。这种将个人的成长推己及人的精神，与夏天万物共同生长的自然景象有着深刻的共鸣。在夏天，不是一棵树独自生长而其他树枯萎，而是万物一齐蓬勃、共同壮大。仁者的精神也应当如此——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

孟子先生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万物都在我的心中完备地存在着。反躬自省，做到真诚，就是最大的快乐。尽力推行恕道，就是求仁最近的途径。

“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如果放在立夏的背景下来理解，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立夏时节，天地之间万物正在蓬勃生长；而在人的内心，“万物”（一切善的潜能）也应当随之蓬勃生长。外在的立夏与内在的立夏，应当同步发生。

五、曾子先生的“日三省吾身”与夏之修养

《论语·学而》记载曾子先生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先生的“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和修养工夫。这种工夫不分四季，但如果结合季节的特点来理解，会有不同的侧重。

春天的修养侧重于“生”——培养善端，让善的种子萌发。夏天的修养则侧重于“长”——让已经萌发的善端不断壮大，同时警惕过度膨胀。夏天的特点是阳气充盈，万物蓬勃，但过犹不及，如果阳气过盛而不加节制，就会导致亢阳之灾。同样，人的精神如果在夏天过于亢奋、过于外放，也会失去内在的平衡。

这就是为什么月令要求天子在孟夏之月“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即使在阳气最盛的季节，也要保持节制和平衡。这体现了儒家“中庸”思想的精髓——不是不动，而是在运动中保持平衡；不是不长，而是在生长中保持节制。

第五章 道家视角：立夏与道之“长”

一、道的四季：生长收藏

在道家哲学中，四季的更替是道的运行在时间维度上的展现。老子先生虽然没有直接讨论节气，但他对道的描述处处与四季的规律相呼应。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的创生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的过程。而四季的运行恰好体现了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冬天是“一”——万物归于沉寂，天地之间只有一片空寂；春天是“二”——阴阳开始分化，万物开始萌动；夏天是“三”——阴阳交感，万物繁衍；到了万物极盛之时，就是“三生万物”的完成。

立夏，正处于从“二”到“三”的转折之处。春天的阴阳分化已经完成，夏天的阴阳交感即将全面展开。在这个时刻，天地之间的生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强度——不是春天那种微弱的、试探性的萌动，而是一种确定的、有力的、不可阻挡的生长。

老子先生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道德经》第十六章）

这段话描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万物并起（夏之“长”），然后各自归根（冬之“藏”），归根就是回到静的状态，回到静就是回归生命的本源。知道这个循环规律的叫做“明”，不知道这个规律而胡乱行动的会遭到凶险。

在这个框架中，立夏代表的是“万物并作”的起始——万物开始一齐蓬勃地生长和活动。老子先生的态度是“观”——静静地观看。他不说要促进万物的生长，也不说要阻止万物的生长，而是说要“观”。这个“观”字极为重要——它既不是参与，也不是冷漠，而是一种超越性的觉知。

为什么要“观”？因为“万物并作”只是循环的一个阶段，不是终点。如果执着于“作”（生长、活动），就会忘记“复”（返归、沉静），从而失去对整体循环的把握。老子先生的智慧在于：即使在万物最蓬勃的夏天，也不忘记秋冬的必然到来；即使在生命最旺盛的时刻，也不忘记归根复命的终极归宿。

二、庄子先生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先生在《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天地有大美却不说话，四时有明确的法则却不议论，万物有成就的道理却不解释。这三句话，道尽了道家对天地万物的基本态度——天道自然而然地运行，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论证，更不需要辩护。

立夏的到来，在庄子先生看来，就是天地之“大美”的一种表现。夏天的蓬勃壮丽——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虫鸣鸟叫、白昼悠长——这一切都是“大美”，但天地不会为此自矜自夸。它只是默默地展开这一切，然后默默地收起这一切。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天地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任何解释和干预，那么月令中那些关于天子应当如何行事的规定，不就是多余的吗？道家和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正是理解先秦思想的一个关键入口。

儒家认为，虽然天道自然运行，但人需要主动地去认识和顺应天道。月令中的种种规定，就是帮助人（特别是统治者）与天道保持同步的指南。人如果不主动努力，就可能偏离天道，从而招致灾祸。

道家则认为，最好的“顺应”就是“不干预”。老子先生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四十八章）做学问是一天天增加知识，修道则是一天天减少人为的干预。减到极致，就是“无为”——不做任何违背自然的事情。而“无为”的结果恰恰是“无不为”——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做成了。

在立夏的语境中，道家的“无为”意味着：不需要天子穿红衣、乘红马来“迎夏”，因为夏天自然会来。不需要通过行赏封侯来模拟天道的慷慨，因为天道本身就是慷慨的。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去干扰天道的自然运行。

当然，这种理解可能过于简化了儒道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儒家的月令规定也可以被理解成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只不过儒家认为人需要通过有意识的行为来实现这种顺应，而道家认为最好的顺应就是放弃有意识的行为。

三、“道法自然”与立夏之气

老子先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这是道家宇宙论最核心的表述。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道取法于自然（“自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自己如此”的意思）。这个四重取法的链条，将人、地、天、道贯穿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秩序。

在立夏时节，“人法地”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人应当观察大地在立夏时的变化——草木茂盛、土壤温暖、虫蚁活跃——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为。但这种调整不是被动的模仿，而是一种深层的共鸣——人的身体和心灵与大地同频共振，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夏”的状态。

“地法天”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大地的变化不是自发的，而是对天的变化的回应——日照增长、太阳升高、雨水增多——这些气象的变化驱动着大地的变化。立夏时节的大地之所以温暖而蓬勃，是因为天（太阳、气候）给予了它足够的光热。

“天法道”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天的运行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遵循着一个更高的法则——道。日月的升降、四季的更替，都是道的运行在天象中的表现。立夏的到来，不是太阳“决定”要升高，而是道的运行使然。

“道法自然”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道本身没有更高的法则可以取法——它只是“自己如此”。道之所以让春天之后是夏天、夏天之后是秋天，不是因为有什么外在的力量要求它这样做，而仅仅是因为“它就是这样”。这是道家思想中最深邃也最难以言说的部分——一切秩序的终极根基不是另一个更高的秩序，而是“自然”——自己如此，本来如此。

四、庄子先生论“物化”与夏之变

庄子先生在《齐物论》末尾讲述了那个著名的“蝴蝶梦”：“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物化”——事物之间的转化。庄子先生用蝴蝶梦来说明，事物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截然分明。庄周可以变成蝴蝶，蝴蝶也可以变成庄周。

而四季的更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最宏大的“物化”。春天“化”为夏天，夏天“化”为秋天——这不是一个季节的“消亡”和另一个季节的“诞生”，而是同一股生命力在不同形态之间的转化。立夏不是春天的终结，而是春天的“物化”——春之气“化”为了夏之气，就像庄周“化”为了蝴蝶。

在这个“物化”的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气的形态变了——从柔和变为炎热，从萌发变为壮盛。但气的本质没变——它始终是同一股生生不息的宇宙之气。正如庄周和蝴蝶虽然形态不同，但生命的本质（道）是同一的。

这种对“变与不变”的辩证理解，是道家对节气最深刻的贡献。它让我们意识到：立夏虽然标志着一个“转折”，但这个转折不是断裂，而是连续。天地之气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它只是在流动中变换着自己的形态。我们之所以设立“立夏”这个节点，不是因为天地之气在这一天突然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标记来提醒自己注意这种持续而微妙的变化。

五、“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先生在《齐物论》中还说过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天地与我同时诞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这不是一句修辞上的夸张，而是一种真实的体验——当人的心灵达到某种境界时，他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自己与天地万物之间没有界限。

在立夏时节体验这种境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温暖的夏风吹拂、当阳光变得灼烈、当蝉鸣响起、当花朵盛放——如果你真的体会到“万物与我为一”，那么这些感受就不再是“外在的”自然现象，而是你自身生命力的展现。夏天不是在“你”之外发生的事情，而是“你”本身正在展开的一个面向。你体内的阳气在上升，你的精神在变得旺盛，你的生命力在扩张——这与草木的生长、虫鸟的活跃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

这种体验，在道家看来，就是“与四时合其序”的最高境界——不是通过外在的仪式和规定来与四时保持同步，而是从内心深处体验到自己就是四时的一部分。

第六章 上古神话中的夏：火神、南方与炎帝

一、炎帝与火德：夏之帝的神话渊源

前文已经提到，月令以炎帝为夏之帝。但炎帝在上古神话中的形象远比月令中的简单配属要丰富和复杂得多。

炎帝，又称神农氏，是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是“尝百草”和“教民稼穡”——通过亲身试吃各种植物来辨别其药性，并教导人民种植五谷。这两项功绩使他成为了农业和医药的始祖。

但为什么炎帝被归于“火德”而非“土德”或“木德”？按照常理，一个与农业相关的神灵似乎更应该属于“土”或“木”（因为农业与土地和草木密切相关）。

答案或许在于“炎”字本身。“炎”从二火，是火上加火的意思，表示极其炽热。炎帝之“炎”，不是普通的火，而是烈火、盛火。而夏天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阳气最盛、日照最长、温度最高。炎帝以“炎”为号，正对应着夏天的炎热特征。

但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先民的观念中，农业与火之间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上古时期的“刀耕火种”就是一种以火来辅助农业的技术——先用火烧掉野草和灌木，然后在焚烧过的灰烬中播种。火不仅清除了杂草，还为土壤提供了肥料（草木灰含有丰富的钾元素）。在这个意义上，火是农业的先驱——没有火的开路，就没有耕种的可能。

炎帝作为农业之神，同时也是火德之帝，或许正反映了这段古老的记忆——在人类农业文明的早期，火与耕种是不可分离的。而夏天，既是火德当令之时，也是农作物生长最旺盛的季节——火与农业的双重关联，在夏天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二、祝融：火神的多重面相

祝融是上古神话中最重要的火神。《山海经·海外南经》对他有简短而生动的描述：“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祝融兽身人面，乘坐两条龙——这个形象充满了原始的力量感。“兽身”暗示着他与自然界的野性力量之间的联系；“人面”则表明他具有与人沟通的能力；“乘两龙”更是显示了他驾驭超自然力量的神威。

《山海经》中关于祝融的记载还有其他版本。《海内经》记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訖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这里将祝融列为炎帝的后代，将火神与火帝联系在了一起——祝融是炎帝血脉的延续，是火德的传承者。

另有记载说祝融“降处于江水”——下降到了长江流域。这个细节非常有趣。长江流域位于中原的南方，而南方在五行体系中属火。祝融“降处于江水”，或许反映了一段古老的历史记忆——某个以火神为图腾的部族向南方迁徙，并在长江流域定居下来。

在月令体系中，祝融是孟夏之月的佐神，辅佐炎帝掌管夏天。他的职责是什么？一种理解是：炎帝作为火德之帝，代表着夏天的宏观秩序；祝融作为火神，则负责具体的“工作”——让阳气充盈、让温度升高、让万物在火的能量中蓬勃生长。

三、南方之谜：为什么夏天与南方相配？

在五行方位体系中，东方属木、配春，南方属火、配夏，西方属金、配秋，北方属水、配冬，中央属土。

为什么南方属火、配夏？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南方更热，所以属火。但仔细想想，这个“不言自明”的答案其实并不充分。中国先民生活在北半球，太阳在夏天确实偏向南方的天空更高处。但“南方更热”这个认知，是先民通过旅行还是通过推理得来的？在通讯和交通极不发达的上古时代，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方圆百里之内。他们是如何形成“南方更热”这个观念的？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不是基于地理经验的判断，而是基于天文观测的推理。太阳在正午时位于南方天空，而正午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刻。因此，南方与热（火）的关联，可能最初来自于对太阳位置的观察，而非对不同地区气候的比较。

太阳正午在南方→南方与热的联系→热属火→南方属火→南方配夏→夏天的方位是南方→迎夏于南郊——这条逻辑链，展示了先民如何从最基本的天文观测出发，一步步构建起了一个宏大的宇宙对应体系。

《山海经·大荒南经》描绘了南方的神话地理：“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南方大荒之中有各种奇异的山川、神灵和国度。这些描述虽然是神话性质的，但它们反映了先民对南方的一种基本感知——南方是一个充满了异质力量的方向，它既令人恐惧又令人向往。

在《楚辞》中，南方的意象更为丰富。屈子先生笔下的南方是芳草繁盛、蕙兰馥郁的世界——“攀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九歌·湘夫人》）南方的植物世界在夏天达到了最繁盛的状态，这与夏天属南方、属火的观念形成了生动的呼应。

四、共工与祝融之战：水火之争的宇宙叙事

上古神话中有一则极为重要的叙事——共工与祝融之战。共工是水神，祝融是火神，他们之间的战斗代表着水与火、北与南、冬与夏之间的宇宙性冲突。

这则神话有多个版本，散见于不同的先秦文献。其中一个版本说共工战败后，怒触不周山，导致天柱折断，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为什么河流都向东南方向流淌。

这则神话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自然地理成因的解释，更是一个关于宇宙秩序如何建立的叙事。水与火的冲突，代表着宇宙中两种基本力量的对抗。这种对抗不是无意义的破坏，而是宇宙秩序得以建立的必要过程——正是通过水火之争，天地才形成了现在的格局。

在四季的框架中，这种水火之争每年都在重复。冬天是水的季节，夏天是火的季节。从冬到夏，是火逐渐战胜水的过程；从夏到冬，是水逐渐战胜火的过程。立夏，正是火开始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阳气（火）已经强大到足以压制阴气（水），天地之间一片火热蓬勃。

但这种“胜利”不是永恒的。正如老子先生所说：“反者道之动”——返回是道运动的方式。火的鼎盛之中已经蕴含着衰落的种子，就像夏至之后白昼开始缩短一样。共工与祝融的战争没有最终的胜者，它只是在不断地循环——这正是四季更替的神话原型。

五、日与夏：太阳崇拜的投影

在先民的心目中，夏天与太阳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夏天日照最长、太阳最高、光热最盛——可以说，夏天就是太阳的季节。

上古时期存在着普遍的太阳崇拜。《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了“十日”的神话：“汤谷上有扶木，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汤谷中有一棵叫做扶桑的大树，十个太阳在这里洗浴。九个太阳停在下面的树枝上，一个太阳停在上面的树枝上。

十个太阳轮流值班，每天一个升上天空照耀大地。但后来十个太阳一起出来，大地被烤焦，于是有了后羿射日的故事。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这才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这则神话与夏天有什么关系？十日并出的灾难，本质上就是“夏天的极端化”——当火的力量（太阳）过于强大时，就不再是滋养生命的力量，而变成了毁灭一切的灾难。后羿射日，恢复了火（阳）与水（阴）之间的平衡，也就恢复了四季正常更替的秩序。

这则神话给我们的启示是：立夏虽然标志着火德的兴起，但火德的兴起必须有度。“盛德在火”不是说火可以无限地膨胀，而是说在这个时节，火德应当恰如其分地发挥其作用——温暖大地，促进万物生长，但不能过度到焚烧一切的程度。

这种“有度”的观念，在儒家表达为“中庸”——“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在道家则表达为“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第四十四章）两家虽然用语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核心洞见：任何力量都有其恰当的边界，超越这个边界就会走向反面。

第七章 《周易》与立夏：乾坤消长的关键节点

一、乾卦与夏之阳

《周易》是先秦思想的百科全书，其中蕴含着对宇宙运行规律最深邃的洞察。虽然《周易》没有直接讨论节气，但其卦象体系与四季的更替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

乾卦（☰）六爻皆阳，代表着纯阳之气。在十二消息卦体系中，乾卦对应的是四月——正好是孟夏之月、立夏所在之月。

十二消息卦，以十二个卦象对应十二个月份，展示了一年之中阴阳消长的过程：

十一月复卦（一阳生），十二月临卦（二阳长），正月泰卦（三阳开泰），二月大壮卦（四阳壮盛），三月夬卦（五阳决阴），四月乾卦（六阳纯阳）——此后阴气开始萌生——五月姤卦（一阴生），六月遁卦（二阴长），七月否卦（三阴三阳），八月观卦（四阴盛），九月剥卦（五阴剥阳），十月坤卦（六阴纯阴）。

立夏所在的四月对应乾卦，六爻皆阳——这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纯最盛的时刻。但恰恰是在这个纯阳之极的时刻，阴气即将从下方萌生（五月姤卦，一阴始于下）。这体现了《周易》最核心的辩证法——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

《周易·乾卦·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大哉乾元”——伟大啊，乾元之气！这是对乾卦所代表的阳气的赞叹。“万物资始”——万物依赖它而开始生命。“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云在天空运行，雨降落滋润大地，万物各自呈现出自己的形态。

在立夏的语境中，这段话有着特别生动的意义。立夏时节，正是乾元之气最为充盈的时候。“云行雨施”——夏天的降雨比春天更加丰沛；“品物流形”——万物在充沛的阳气和雨水的滋养下，各自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形态。这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立夏时节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自然景象。

“保合太和”——保持并达到最高的和谐。这四个字是乾卦哲学的精髓，也是理解立夏之道的关键。“太和”不是静止的平衡，而是在极度充盈中的和谐。立夏时节，阳气虽盛，但并不失和——天地之间的一切都在蓬勃生长，但又各得其所、互不妨碍。这种状态就是“太和”。

二、乾卦六爻与夏之进程

乾卦六爻从下到上的变化，恰好可以用来描述从初春到盛夏的阳气增长过程：

初九：“潜龙勿用。”——阳气刚刚萌生，如同潜伏在地下的龙，还不适合发挥作用。这对应着冬末春初，阳气初动但力量尚弱的阶段。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龙出现在田野上，开始展示自己的力量。这对应着春天，万物开始萌发，阳气开始在大地上显现。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整天勤勉不息，夜晚也保持警惕。这对应着暮春，阳气虽然在增长，但尚未达到稳定，需要持续的努力和警觉。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龙或跃或潜，进退自如。这对应着立夏前后，阳气已经很强但尚在试探和调整，正在寻找最佳的发力方式。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龙飞翔在天空中，这是阳气最为强盛而又恰到好处的状态。这对应着仲夏（夏至前后），阳气达到鼎盛，但又保持着完美的平衡。

上九：“亢龙有悔。”——龙飞得太高，过刚则折。这对应着阳极阴生的转折点，阳气过度亢盛，开始走向反面。

在这个六爻的框架中，立夏大致对应着九四到九五的阶段——阳气已经非常强盛，正在从“或跃在渊”的试探状态走向“飞龙在天”的鼎盛状态。这是一个充满力量而又需要智慧来驾驭的阶段。

为什么需要智慧？因为从九五到上九只有一步之遥——从完美的强盛到过度的亢奋，中间的界限非常微妙。月令之所以强调立夏时节要“节嗜欲、定心气”，正是要帮助人在阳气最盛的时刻保持清醒和节制，避免从九五的“飞龙在天”滑向上九的“亢龙有悔”。

三、《周易·系辞》论“变”与立夏之变

《周易·系辞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天上呈现出天象（日月星辰的运行），地上呈现出形态（山川草木的变化），“变化”就在这些现象中显现出来。立夏，正是这种“变化”最为显著的时刻之一——天象在变（日照增长、星宿移位），地形在变（草木茂盛、虫蚁活跃），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阴阳之气消长的“变化”在驱动着一切。

《系辞》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就是阴阳的交替运行。立夏标志着阳气的进一步增长和阴气的进一步减少，这是“一阴一阳”的道在特定时段的具体表现。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延续这个过程（阴阳交替）就是善，完成这个过程（万物生成）就是性。立夏延续着春天开始的阳气增长过程，使万物从萌发走向壮大——这就是“善”；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生物都实现了自己的本性（性）——草成为更高的草，树成为更大的树，蝉开始鸣叫，蚯蚓开始活动——这就是“成之者性”。

《系辞》的这番论述，为我们理解立夏提供了一个深邃的哲学框架：立夏不是一个孤立的时间节点，而是宇宙之道持续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承接着春天的“善”（生发），开启着夏天的“性”（生长），最终通向秋天的“收”和冬天的“藏”。在这个永不停歇的循环中，每一个节气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离卦与夏之象

在八卦与四季的对应关系中，离卦（☲）对应夏天。离卦上下皆阳，中间为阴，其象为火、为日、为明。

《周易·说卦传》说：“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离卦代表光明，在它的照耀下，万物都彼此可见。它是南方的卦象。

“万物皆相见”——这是对夏天最精炼的描述。在夏天的充足光照下，万物无所遁形，一切都在光明中展露自己的面貌。春天的万物还是含蓄的、半遮半掩的（如含苞待放的花蕾）；到了夏天，一切都完全展开了——花朵全部绽放，树冠完全展开，虫鸟全部活跃，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天地之间。

离卦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外阳内阴。外面的两个阳爻代表着夏天外在的热烈和明亮；中间的一个阴爻则暗示着在这热烈和明亮的外表之下，还有一丝阴的力量在默默运行。这与我们前面分析的“阳极阴生”的道理完全一致——即使在纯阳的乾月（四月），阴气也已经在酝酿，即将在下个月（五月，姤卦）萌生。离卦以其巧妙的结构，揭示了这一个深层的真相。

《说卦传》还说离卦“为日，为电”——离卦象征太阳和闪电。太阳是恒常的光明，闪电是突发的光明。夏天兼具这两种光明——白昼漫长的阳光和雷雨中的闪电。这两种光明的并存，构成了夏天独特的天象——既有持续的炎热，又有间歇的雷雨。

第八章 立夏的物候世界：万物如何“知道”夏天来了？

一、物候的哲学意义

前文已经提到，《逸周书·时训解》记载了立夏的三候：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但我们还没有深入探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万物是如何“知道”夏天来了的？

先民显然注意到了这个令人惊叹的现象——每到特定的时节，特定的生物就会做出特定的反应，年复一年，准确无误。蝼蝈不需要查看日历就知道什么时候该鸣叫，蚯蚓不需要测量日影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土，王瓜不需要阅读月令就知道什么时候该生长。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在先秦思想家看来，答案是“气”。万物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感应季节的变化，是因为它们与天地之气保持着直接的联通。天地之气发生了变化（从春气转为夏气），万物就会相应地做出反应。这不需要意识、不需要推理、不需要学习——它是一种本能的、直接的、无中介的感应。

庄子先生描述了一种理想的认知方式：“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应帝王》）至人的心灵像镜子一样——不追逐、不迎合，只是如实地映照。而万物对天地之气的感应，正像这面镜子——它们不“追逐”夏天的到来，也不“迎合”夏天的到来，而是当夏天的气到来时，它们自然而然地做出了回应。

这种理解将物候观察从“预测天气的工具”提升到了“感悟天道的途径”——通过观察万物如何回应天地之气的变化，人可以学习到一种与天道相应的生存方式。

二、“蝼蝈鸣”：声音中的宇宙

立夏一候“蝼蝈鸣”。蝼蝈，一般认为是蝼蛄或某种蛙类。无论具体是哪种生物，关键在于“鸣”——声音。

为什么先民将“声音”作为立夏到来的第一个标志？这与先秦对声音的深层理解有关。

《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音的产生源于心的运动，心的运动源于外物的感发。也就是说，声音是“感应”的产物——是内心对外界刺激的回音。

将这个理论推广到动物界，蝼蝈之所以在立夏时开始鸣叫，是因为它们的“心”被夏天的气所“感动”了。天地之气从春转夏，温度升高、光照增长，这些变化“感”于蝼蝈之身，蝼蝈便以鸣叫来“形于声”。

更进一步，声音不仅是“感应”的产物，还是“气”的一种表现形态。《吕氏春秋·大乐》说：“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音乐（声音）的起源非常久远，它产生于度量，根源于太一（宇宙的本源）。

在这个框架中，蝼蝈在立夏时的鸣叫不是一个偶然的生物学事件，而是宇宙之气在声音维度上的一种表现。夏天的气是“徵”音的气——激昂而高亢。蝼蝈的鸣叫正是对这种“徵”气的回应。

三、“蚯蚓出”：大地的呼吸

立夏二候“蚯蚓出”。蚯蚓生活在土壤之中，它们的活动状态直接反映着土壤的状况。

蚯蚓在立夏时从深层土壤中活动到浅层乃至地表，这是因为地温在升高——夏天的阳气不仅在天上（日照增长），也在地下（地温升高）发挥作用。阳气从天上向下渗透，从地表向深处延伸，最终使整个土壤层都变得温暖起来。蚯蚓对温度极为敏感，当深层土壤的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它们便开始向上活动。

在先秦的宇宙观中，蚯蚓之“出”有着更深层的象征意义。蚯蚓是“阴”的代表——它们生活在黑暗的泥土中，身体柔软、湿润、冰凉，完全符合“阴”的特征。而它们在立夏时“出”到地表，可以被理解为阴气被阳气“召唤”出来——阳气的增长如此强大，连最深层的阴也无法继续隐藏，不得不浮出地表。

这与十二消息卦的道理相呼应。乾卦（四月，立夏所在之月）六爻皆阳——阳气已经充满了从地到天的整个空间，阴气无处躲藏。蚯蚓（阴的象征）被迫出土，正是这种“阳极”状态的具体表现。

但同时，蚯蚓的出现也暗示着一个吊诡的事实：阴虽然被“挤”出来了，但它并没有消失。它就在那里，在阳光下，在我们的视野中——这正预示着下一个月（五月）阴气将会从下方重新萌生。阴的“出”不是消亡，而是转化的序曲。

四、“王瓜生”：生长的具象化

立夏三候“王瓜生”。王瓜是一种攀援植物，其果实在成熟时呈红色。

为什么在立夏三候中要特别提到王瓜？这或许与它的生长特性有关——王瓜是夏天才开始快速生长的植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夏天特有的生长力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更重要的是，王瓜是一种攀援植物——它向上生长、不断延伸、缠绕攀附。这种向上的、扩展的生长方式，正是“火性炎上”的具象化。春天的植物生长是含蓄的、缓慢的、向内积蓄力量的；而夏天的植物生长是奔放的、迅速的、向外扩展的。王瓜的攀援生长，完美地诠释了夏天“长”的本质——不是静静地

增大，而是积极地、甚至是急切地向着天空和光明延伸。

"生"这个字也值得细究。在先秦汉语中，"生"有多重含义：出生、生长、生命、活着。王瓜之"生"，既是它开始生长的事实性描述，也隐喻着一种更广泛的"生"——在立夏时节，一切都在"生"——新的生命在诞生，已有的生命在生长，生命的力量在蔓延扩展。

第九章 阴阳五行与立夏：一套完整的宇宙语法

一、阴阳消长：立夏处于何处？

要深入理解立夏在阴阳体系中的位置，我们需要把握阴阳消长的全年节奏。

一年之中，阳气与阴气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冬至是阴极阳生的转折点——阴气达到极盛，阳气开始萌生。此后阳气逐渐增长，经过立春（阳气初露）、春分（阴阳平衡），到立夏时，阳气已经大大超过阴气，进入了"盛阳"的阶段。夏至则是阳极阴生的转折点——阳气达到极盛，阴气开始萌生。

在这个框架中，立夏处于阳气"由盛转极"的关键阶段。它不是阳气的起点（那是冬至），不是阳气的平衡点（那是春分），也不是阳气的极点（那是夏至），而是阳气已经非常强盛、即将走向极盛的阶段。

这个位置有什么特殊意义？它意味着立夏是阳气"壮年"的开始——就像一个人从青年步入壮年一样，力量充沛、精力旺盛、充满干劲，但同时也需要开始学会节制和调控，以免过度消耗导致早衰。

《管子·四时》说："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发五政。"春天以甲乙（木）之日施行政令，夏天以丙丁（火）之日施行政令。政令的五行属性要与季节的五行属性相配，这是"顺时"的要求。

《管子》的这段话还暗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不同季节需要不同性质的治理。春天的治理应当像木一样——生发、柔和、条达；夏天的治理应当像火一样——光明、热烈、有力。立夏标志着治理方式从"木性"向"火性"的转换。

二、五行之火：不仅仅是炎热

在先秦的五行体系中，"火"是一个极为丰富的概念，远远不止于"炎热"这一个属性。

《尚书·洪范》记载了五行的基本性质："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穡。"火的基本性质是"炎上"——热烈而向上。

"炎上"这两个字包含着多层含义。"炎"是热烈，意味着火性的存在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火可以点燃周围的一切，将自己的热传递给其他事物。"上"是向上运动，意味着火性具有升腾、扩展、向外辐射的趋势。

这两个特征合在一起，描绘了夏天天地之气的状态：热烈而向上。温度在升高，热气在上升，万物在向上生长——一切都在向着天空、向着光明、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延伸。

但"炎上"还有另一个隐含的意义——火的能量是向外发散的，如果不加节制，最终会耗尽自身。这就是为什么在月令中，孟夏之月的政令要求"节嗜欲、定心气"——在火气最盛的季节，尤其需要内在的收敛和节制来防止过度的发散。

三、五行相生：木生火与春夏之交

在五行相生的体系中，木生火——木可以燃烧产生火，因此木是火的母亲。将这个关系投射到季节上，春天（木）生出夏天（火）——春天的生长力（木气）积蓄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夏天的热烈（火气）。

这个"木生火"的过程，就是从春到夏的转换，而立夏正是这个转换的节点。在立夏之前，天地之气以"木"的性质为主——生发、柔和、向上延展。在立夏之后，天地之气逐渐以"火"的性质为主——炎热、光明、向外辐射。

但"生"不是"替代"——木生火不是说木消失了，而是说木的能量转化为了火的能量。就像母亲生了孩子，母亲并没有消失。在立夏之后，春天的"木气"并没有完全消失，它只是被融入了夏天的"火气"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初夏的感觉与仲夏不同。在立夏刚过的初夏，天气中还残留着春天的柔和——虽然已经变暖，但还不太热；虽然阳光已经变强，但还不太烈。木气（春）与火气（夏）在这个时段并存、融合、过渡。到了仲夏（夏至前后），火气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木气才真正退入了背景。

四、五行相克：火克金的深意

在五行相克的体系中，火克金——火可以熔化金属。将这个关系投射到季节上，夏天（火）克制秋天（金）——当夏天的火气旺盛时，秋天的金气（收敛、肃杀）就被压制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月令要求在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发大众”——这些行为具有“金”的性质（收敛、切割、整理），在火气旺盛的夏天施行金性的政令，就是火与金的冲突。虽然火克金，火占上风，但这种冲突本身就会产生不和谐，导致灾异。

最好的做法是让每个季节的本气充分发挥作用，而不要引入被它克制的那种气。夏天行火德之政（光明、慷慨、促进生长），而不要行金德之政（收敛、刑罚、抑制活动）——这就是“顺时”。

五、为什么先民如此执着于五行对应？

回顾以上分析，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浮现出来：先民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将一切事物都纳入五行的对应体系？这种执着的背后是什么？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五行体系是先民面对一个复杂到令人眩晕的世界时，所发展出的一种“化简”策略。天地之间万物纷繁，千变万化，如果不找到某种统一的框架来加以整理，人就会迷失在无尽的混乱之中。五行体系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它将无限多样的事物归纳为五种基本类型，并揭示了这五种类型之间的关系（相生、相克）。有了这个框架，人就可以从任何一个局部出发，推知整体的状况——看到某种花开了，就知道天地之气处于什么阶段；看到某种鸟鸣叫了，就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但这种解释或许还不够深入。五行体系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具，更是一种信仰——先民真诚地相信，天地万物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深层的对应关系。它不是人为的分类，而是宇宙本身的结构。认识这个结构，就是认识道；遵循这个结构，就是顺应道。

在这个意义上，五行体系与立夏的关系不是“五行体系被应用于解释立夏”，而是“立夏本身就是五行运行的一个环节”。火气的兴盛、木气的消退、金气的被克——这些不是人贴上去的标签，而是天地之间真实发生的过程。先民的工作不是“发明”这些对应关系，而是“发现”它们。

第十章 立夏与农耕：大地之上的人事

一、“不违农时”：孟子先生的农政智慧

孟子先生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仁政”方案，其核心之一就是“不违农时”：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

不违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用细密的网到深水中捕鱼，鱼鳖就吃不完；按照时节到山林中砍伐，木材就用不完。

在这段话中，“不违农时”被列为仁政的第一条。为什么？因为农时是天道在人间直接体现——如果不按时播种、不按时耕耘、不按时收获，再好的治理也无法让百姓温饱。

立夏在农耕中的地位是什么？立夏标志着农作物进入了快速生长期。春天播下的种子，到立夏时已经发芽出苗、扎根成长，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确保它们在整个夏天得到充足的水分和养分，不受病虫害的侵扰，顺利地生长壮大。

《管子·牧民》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廩。”拥有土地、牧养百姓的统治者，其要务在于遵循四时，其守护在于保障仓廩充实。“务在四时”——这四个字道出了农业社会的根本法则：一切以时节为准。立夏是夏季农事的起点，错过了这个时节的工作安排，整个夏天的农事都会被打乱。

二、《诗经》中的夏日农事

《诗经·豳风·七月》是一首详细描绘全年农事的长诗，其中对夏天的描述尤为生动：

“四月秀葇，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萼。”

四月远志草开花，五月蝉开始鸣叫。这些物候标志着夏天的到来。而“八月其获”（八月收获）则提醒我们：夏天的辛勤劳作，最终将在秋天结出果实。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六月吃野李和野葡萄，七月煮葵菜和大豆。夏天的食物与春天不同——春天主要吃的是储存的冬粮和刚刚冒出的嫩芽，而夏天则有了新鲜的果蔬。这种饮食的变化，也是立夏之后天地之气转变的一个体现。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春天的时候阳光和煦，黄莺在鸣叫。女子们提着深筐，沿着小路，去采摘嫩桑叶。采桑是春末夏初的重要活动——蚕要吃新鲜的桑叶才能吐丝结茧。立夏前后，正是蚕事最繁忙的时节。

这些诗句让我们看到，立夏在先民的生活中不是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而是与一系列具体的、实在的、关乎生计的活动紧密相连的。采桑、养蚕、除草、灌溉、防虫——每一项工作都有其特定的时间窗口，而立夏正是这些时间窗口开始集中开启的时刻。

三、水利与立夏：夏天的水为什么特别重要？

立夏之后，降水开始增多（至少在中原地区是如此）。夏天的雨水对农业至关重要——没有充足的降水，炎热的夏天就会变成干旱，庄稼就会枯死。

《管子·度地》对水利有详细的论述：“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圣人选择建国之地，必须是地势不会倾斜的地方，并选择土地肥沃之处，靠近山水泽国。

水在夏天的特殊重要性，与五行的关系也值得思考。夏天属火，而水克火。在通常的理解中，“被克”是不好的——火气当令的时候，水应该被压制。但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夏天的水（降雨）恰恰是火气的必要补充——如果只有火（炎热）而没有水（降雨），大地就会干裂，万物就会枯萎。

这揭示了五行“相克”的另一层含义——“克”不一定是消灭，也可以是调节。火克金、水克火——这些“克”的关系在自然界的实际运作中，往往表现为一种制衡和调节，而不是简单的对抗和消灭。夏天的雨水“克制”了夏天的炎热，使得温度不至于无限制地升高，为万物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水分——这种“克”恰恰是“保合太和”的体现。

四、“使民以时”：孔子先生的政治伦理

孔子先生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地处理政事并守信用，节约财物并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在适当的时候。“使民以时”——这四个字，是孔子先生政治伦理的核心之一。

在立夏的语境中，“使民以时”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统治者必须了解：立夏之后是农忙季节，百姓需要在田间劳作。这个时候如果征发大规模的劳役（如修建宫殿、挖掘河道），就是“不以时”——不在适当的时候役使百姓。百姓被从田间抽走，庄稼无人照料，秋天就会歉收，百姓就会挨饿——这就是“不以时”的后果。

这与月令中“毋发大众”的规定完全一致。月令的这条禁令不是出于对百姓的同情（虽然同情也是原因之一），更是出于对天道的敬畏——在万物“长”的季节做“收”的事情，就是逆天道而行。孔子先生将这种敬畏转化为了一条清晰的政治伦理原则——“使民以时”。

第十一章 立夏与身心修养：先秦的“夏季养生”之道

一、“养长”之道：夏天的身心状态

《吕氏春秋·孟夏纪》在描述了孟夏之月的天象和政令之后，还特别提到了身心修养的要求：

“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

天子开始穿细葛布做的衣服（因为天气变热了），命令管理田猎的官员巡视田野和原野，为天子代劳。命令司徒巡行各县各乡，勉励农人勤勉劳作，不要在城里休息。

这些规定反映了立夏之后身心状态的转变——从春天的收敛走向夏天的外放。穿上薄衣是身体的外放，巡行田野是活动的外放，勤勉劳作是精力的外放。整个人的生命状态，应当随着天地之气的变化而变化——夏天的气是外放的、扩展的、活跃的，人也应当如此。

但同时，月令也强调了节制的重要性。前文提到的“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正是对过度外放的矫正。夏天的阳气虽盛，但如果人过度放纵自己的欲望和活动，就会导致精力的过度消耗，到了秋冬就会因为“底子”不足而生病。

这种“外放中有节制”的辩证法，正是先秦养生思想的精髓。它不是简单地讲“夏天要活跃”或“夏天要清静”，而是说“要在活跃中保持清静，在清静中不失活跃”。这与《周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的境界相通——龙在天空飞翔，这是极致的活跃；但飞翔中的龙不是失控的，而是自在的、从容的——这就是“活跃中的清静”。

二、老子先生的“清静”与夏之养

老子先生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德经》第十六章）

达到虚空的极致，守住安静的笃实。万物纷纷涌动，我从中观察循环回归的规律。

在夏天这个万物“并作”的季节，老子先生的建议是什么？是“观”——静静地观看。不是不让万物活动，也不是要自己也跟着疯狂活动，而是在万物的蓬勃活动中保持内心的虚静。

这种“虚静”不是与世隔绝的冷漠，而是一种深层的觉知。就像池塘的水面——即使微风吹过，涟漪荡漾，水面之下的深处依然是宁静的。夏天的身心修养，就是在外在活动的“涟漪”之下，保持内在心灵的“深静”。

老子先生又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道德经》第二十六章）沉重是轻浮的根基，安静是躁动的主宰。在夏天这个容易让人躁动的季节，尤其需要以“静”来制“躁”——不是压抑活力，而是让活力有一个稳定的根基。

这与月令中“定心气”的要求完全一致。“定心气”不是让心停止活动，而是让心有一个稳定的“根”——即使外在的世界炎热喧嚣，内心依然可以保持一份清凉和安宁。

三、庄子先生的“心斋”与“坐忘”

庄子先生在《人间世》中提出了“心斋”的概念：“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集中你的心志，不要用耳朵去听而用心去听，不要用心去听而用气去听。耳朵只能接收声音，心只能接收感应，但气——它是虚空的，能够容纳一切事物。只有道聚集在虚空之中。虚空，就是心斋。

“心斋”——内心的斋戒。在立夏的语境中，“心斋”意味着：在夏天这个感官刺激最为强烈的季节（阳光灼烈、虫鸣喧嚣、花香浓郁），要学会让内心回归虚空，不被外在的刺激所牵引。

庄子先生在《大宗师》中又提到了“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忘掉肢体的存在，抛弃聪明才智，脱离形体、去除知识，与大道相通。这就是“坐忘”。

“坐忘”是一种极致的静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不再是一个与天地分离的个体，而是与天地融为一体。在夏天进入“坐忘”的状态，人会体验到什么？或许他会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消融——不再有“内”与“外”的界限，自己就是那阵热风，自己就是那片蝉鸣，自己就是那棵向上生长的树。这种体验，与前文分析的庄子先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完全一致。

四、身体与季节：先秦的身体观

先秦思想家普遍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宇宙，与天地这个大宇宙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在这个“身体-宇宙”的对应关系中，夏天对应着身体的什么状态？

《管子·内业》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精是气的精华，气运行起来就产生了生命，生命产生了思维，思维产生了知识，知识就到了终点。

在夏天，人体的“气”处于最旺盛的状态——阳气充盈、精力旺盛、活动能力强。如果不加以调控，旺盛的气容易外散，导致精的耗损。这就是为什么先秦养生思想强调夏天要“节嗜欲”——不是因为欲望本身是坏的，而是因为气最旺盛的时候最容易过度消耗。

《管子·内业》又说：“能正能静，然后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枝坚固，可以为精舍。”能够端正、能够安静，然后就能安定。心安定在身体中央，耳目就会聪明，四肢就会强健，身体就可以成为精气的居所。

“精舍”——精气居住的房子。身体就是精气的居所。夏天要维护好这个“精舍”，不让精气因为过度的外放而流失。这不是要把精气“关”在身体里不让它动，而是要让它在合理的范围内运动——就像月令所说的“继长增高”，让身体的能量继续增长和提升，但不要过度挥霍。

第十二章 立夏之礼：迎夏仪式的深层结构

一、迎夏于南郊：仪式的空间结构

前文已经提到，月令要求天子在立夏之日“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这个仪式的空间结构。

“南郊”——京城的南面郊外。这个位置的选择不是随意的。在先秦的空间观念中，四方各有其意义：东方属春、属木、属生；南方属夏、属火、属长；西方属秋、属金、属收；北方属冬、属水、属藏。天子迎夏于南郊，是到夏天“来”的方向“去”迎接它。

为什么要“迎”？这个字蕴含着一种非常深层的礼仪精神——先民将四季的到来视为一种“来访”，就像尊贵的客人来到家中一样。主人应当出门迎接客人，以示恭敬和欢迎。天子出城到南郊去迎接夏天，就是以一国之主的身分，恭敬地欢迎夏天这位“贵客”的到来。

这种拟人化的理解方式，反映了先民对季节的一种根本态度——季节不是一个无生命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有意识、有品格的存在。夏天有其“德”（火德），有其“帝”（炎帝），有其“神”（祝融），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可以被迎接、被招待、被恭敬对待的“存在”。

二、赤色之礼：以色配德

迎夏仪式中，天子“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一切都是红色的。这种全面的赤色装扮，不是为了视觉效果，而是为了与夏天的火德相呼应。

在先秦的礼仪思想中，颜色不仅是审美的，更是宇宙论的。每种颜色对应着特定的五行、特定的方位、特定的季节。穿戴与当令五行相应的颜色，是统治者“与天地合其德”的具体方式。

《礼记·月令》对四季天子服色的规定是：春天衣青（木之色），夏天衣朱（火之色），中央衣黄（土之色），秋天衣白（金之色），冬天衣黑（水之色）。这套服色制度，将统治者的身体变成了一块“宇宙画布”——通过改变身上的颜色，天子在四季中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宇宙意义。

为什么颜色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一种解释是：颜色是最直观、最强烈的视觉信号。当天子身穿赤衣、乘坐赤车出现在南郊时，所有参与仪式的人立刻就能看到——夏天来了，火德当令。颜色成了一种无声的宣告，一种不需要语言就能传达的信息。

更深层的解释是：在先秦的宇宙观中，颜色不仅是光的不同波长（这是现代物理学的解释），更是“气”的不同形态。赤色不仅“代表”火，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火——赤色的视觉感受与火的热烈本质，在先民的感知中是同一种气的不同表现。因此，穿戴赤色不仅是象征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它使穿戴者更接近于火德之气，从而更好地与夏天的宇宙秩序相融合。

三、行赏封侯：政治仪式的宇宙意义

迎夏归来之后，天子“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行赏封侯，普天同庆。

为什么在立夏之后要行赏封侯？前文已经从“顺应天道”的角度做了解释——夏天是“长”的季节，天道在这个时节是给予的、扩展的，所以统治者也应当慷慨给予。但这里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含义。

“封”字本身就含有“培土”的意思——封土建国，给诸侯一片土地。而立夏正是万物在土地上蓬勃生长的时节。在万物生长的时候“封土”——把土地分出去，让更多的人去经营和耕种——这在象征层面上就是“助长”——帮助万物更好地生长。

“赏”则是给予——给予功臣以财物和荣誉。夏天的阳光慷慨地给予万物以光热，使它们得以生长；天子效法这种慷慨，给予臣下以赏赐。这种“效法天道”的理念，是先秦政治仪式最根本的逻辑基础。

“无不欣说”——没有人不高兴。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寓意深刻。“欣”和“说”（悦）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先民认为，如果仪式是正确的（即与天道合拍的），参与者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到喜悦——这种喜悦不是被命令出来的，而是天地之气在人心引发的自然反应。夏天的阳气充盈，人心也应当随之明朗开阔。如果仪式之后人们感到喜悦，说明天人之间的和谐已经达成；如果人们没有感到喜悦，则说明仪式出了问题，天人之间的沟通出了障碍。

四、祭灶之礼：火与日常生活的联结

月令规定孟夏之月“具祀灶”。灶祭在先秦的祭祀体系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不像天地之祭那样宏大庄严，而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小祭”。

灶是家庭的中心——在那个时代，灶火不仅是烹饪食物的工具，更是家庭温暖的来源、光明的来源。一个家庭的灶火如果熄灭了，意味着这个家庭失去了活力。因此，灶不仅是一个物质性的设施，更是家庭生命力的象征。

在夏天祭祀灶神，将宇宙层面的火德（炎帝、祝融）与家庭层面的火（灶火）联结在一起。它提醒人们：天上的太阳之火与家中的灶火，虽然规模悬殊，但本质相同——都是火德的体现。通过祭灶，普通百姓也参与到了迎夏的宇宙性仪式之中——他们不需要去南郊参加天子的大典，只需要在自己的灶前恭敬地祭祀，就完成了与天地火德的沟通。

这种将宇宙性仪式“下放”到日常生活中的做法，是先秦礼仪思想的一大特色。它确保了不仅统治者，而且普通百姓也能参与到天人交往的过程中来——虽然参与的方式和规模不同，但参与的本质（与天道保持同步）是一致的。

第十三章 《楚辞》中的夏：南方的诗意与幽情

一、屈子先生笔下的夏之草木

在先秦文学中，《楚辞》对夏天的描写最为瑰丽动人。屈子先生生长于楚地，那里的夏天比中原更加炎热、更加繁茂，因此他笔下的夏之意象也更加浓烈。

《离骚》中有大量关于芳草香花的描写：“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这些芳草香花，许多都在春末夏初达到最茂盛的状态。

屈子先生以芳草比喻美德，以恶草比喻小人。在这个隐喻体系中，夏天芳草的茂盛就象征着美德的充盈，而杂草的蔓延则象征着邪恶的滋长。立夏，在《楚辞》的意象世界中，就是美德与邪恶同时壮大的时刻——正如现实世界中，夏天不仅让有益的庄稼生长，也让有害的杂草疯长。

这个洞见给立夏增添了一层伦理的紧张感——夏天的生长力是不分善恶的，它同等地滋养着美德和邪恶。因此，人在夏天不能仅仅被动地享受生长的快乐，还必须主动地去“除”心中的“杂草”——那些不好的念头、不正的欲望、不义的行为。

二、《九歌》与夏之神灵

《九歌》是屈子先生根据楚地的祭祀歌舞创作的组诗，其中涉及了多位与夏天相关的神灵。

《东君》是祭祀太阳神的诗篇：“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太阳将要由东方升起，照耀着我们门前的扶桑树。太阳在夏天最为强盛，《东君》中所描绘的太阳的壮丽和威严，正是夏天阳气充盈的诗意表达。

《云中君》是祭祀云神的诗篇：“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在兰花汤中沐浴，穿上华丽的衣裳如同花朵。夏天的云在先秦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夏云高耸壮丽，时而化为暴雨，时而化为彩虹。“云行雨施”是乾卦对夏天天象的描述，而《云中君》则将这种天象人格化为一位美丽而飘渺的神灵。

这些楚地的祭祀传统，虽然在形式上与中原的月令体系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都是通过仪式来沟通天人，通过对季节性神灵的祭祀来表达对天道的敬畏和顺从。

三、屈子先生的“哀时”：当季节成为悲伤的隐喻

屈子先生在《离骚》中有一句极其著名的感叹：“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日月飞逝不肯停留，春天与秋天交替更迭。只看到草木的凋零，就担忧美人（比喻自己或贤臣）的衰老。

在这里，季节的更替不再是客观的天文现象，而成为了内心焦虑的隐喻。时间在流逝，季节在变换，而人的理想还没有实现——这种紧迫感，使得每一个节气的到来都带上了一层忧伤的色彩。

立夏在这种情感框架中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春天已经过去了。那些在春天没有做成的事、没有说出的话、没有实现的愿望，再也不能在春天的温柔中慢慢等待了。夏天来了，时间的紧迫感加剧了——如果夏天也不能有所作为，那就只剩下秋冬的萧瑟了。

这种对时间的焦虑，在先秦文学中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它与月令中那种从容、有序的时间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月令告诉你“每个季节该做的事就好”，而屈子先生却在焦虑“时间来不及了”。这两种态度的冲突，反映了先秦思想中个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宇宙是有序的、循环的、永恒的，但个人是有限的、线性的、终有一死的。在宇宙的永恒循环中，个人的时间只是转瞬即逝的一段。立夏的到来，既是宇宙循环的一个普通环节，也是个人生命又消逝了一段的提醒。

第十四章 “为什么”的追问：立夏的哲学疑难

一、为什么天地之气会有“转折”？

我们已经详细描述了立夏的天文基础、物候现象、仪式规定和哲学意义。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始终没有被正面回答：为什么天地之气会有转折？为什么阴阳的消长不是匀速的、平滑的，而是有节气这样的“转折点”？

老子先生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德经》第四十章）返回是道运动的方式，柔弱是道发挥作用的方式。道的运动本质上就是“反”——不断地往返循环。如果道的运动是单向的（只增不减或只减不减），那就不会有季节的更替。正是因为道的运动是“反”的——阳增到极就开始减，阴增到极就开始增——才有了春夏秋冬的循环。

而节气，就是这个循环运动中的“节”（关节）。关节是身体弯曲和转向的地方。节气是天道运行弯曲和转向的地方。立夏这个“节”，标志着天道从春天的“生”弯转到了夏天的“长”——运动的方向虽然没有改变（仍然是阳增阴减），但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柔和的萌发变为强烈的壮大）。

但这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为什么道要做圆周运动而不是直线运动？为什么要有“反”？

《周易·系辞》给出了一个暗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日与月相互推动，就产生了光明；寒与暑相互推动，就形成了年岁。

“相推”——互相推动。这个词揭示了循环运动的动力机制：不是外力在驱动循环，而是循环中的两种力量（阴与阳、寒与暑、日与月）在互相推动。阳增到极，它自身就产生了一种“推”的力量，把阴推出来；阴增到极，也同样把阳推出来。这种自我驱动的循环，就是道的本质。

为什么道要以这种方式运动？或许这个“为什么”是没有答案的——就像老子先生所说的“道法自然”——道就是“自己这样”的，没有更高的理由可以解释它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节气的存在，就是道“自己这样”的一个结果。

二、为什么人需要“迎夏”？

另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夏天自己会来，为什么还需要天子去“迎”？如果天道是客观运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迎夏仪式的意义何在？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回答。

第一个层面是认识论的。荀子先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道确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是否认识天道、是否顺应天道，却关系到人自身的安危祸福。迎夏仪式的意义不在于“让夏天来”（夏天不需要人的邀请），而在于“提醒人夏天来了”——通过庄严的仪式，引起统治者和民众对季节转换的重视，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新的季节。

第二个层面是存在论的。在先秦思想家看来，人不是宇宙的旁观者，而是宇宙的参与者。天地之气的运行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的行为确实会影响天地之气的运行质量。如果有人顺应天道，天地之气的运行就会更加和谐顺畅；如果有人逆天道而行，天地之气就会受到干扰，从而导致灾异。

在这个意义上，迎夏仪式不是一种被动的“接收”，而是一种主动的“参与”——天子通过庄严的仪式向天地表明：人间准备好迎接夏天了，人间将会顺应夏天的法则来行事。这种表态，在先民的信念中，确实会对天地之气的运行产生正面的影响。

三、为什么四季是四而不是三或五？

这个问题看似无厘头，实则触及了先秦宇宙论的一个深层结构。

为什么是四季而不是三季或五季？一种天文学的回答是：地球绑轴倾斜和围绕太阳公转导致了四个明显的气候阶段——虽然先民没有这些现代天文学知识，但他们通过长期观测确实发现了一年之中有四个相对明显的气候转折点（二分二至）。

但先秦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更加深刻。四季的存在与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阳气主升、阴气主降。阳升到极就转而下降，阴降到极就转而上升。这就产生了四个关键的阶段：阳升（春）、阳极（夏）、阳降（秋）、阴极（冬，实际上是阴极）。

更有趣的是五行体系中的“五季”——春、夏、长夏（季夏）、秋、冬。长夏被插入在夏与秋之间，对应五行中的“土”。为什么要加入这“第五个季节”？因为五行体系需要五个类别来完成其分类功能，四季只有四个，不够用。于是在夏秋之交加入了“长夏”（或将其分散到四季之间，所谓“土旺四季”），使季节数量与五行匹配。

这告诉我们：先民对季节的划分不仅基于自然观察，还受到了理论框架的影响。四季是自然观察的结果，五季则是理论建构的产物。这二者之间的张力——自然与理论、经验与系统——贯穿了整个先秦宇宙论的发展历程。

四、为什么立夏的物候是“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而不是别的？

这个问题前文有所涉及，但还可以更深入地追问。

三候的选择遵循着一个“从天到地”的逻辑：蝼蝈鸣（声音，传播于空中）→蚯蚓出（从地下到地上）→王瓜生（植物在地面上生长）。声音→地下→地上，形成了一个从无形到有形、从隐到显的序列。

这个序列反映了立夏时阳气渗透的过程——先是气（声音是气的振动），然后是地（蚯蚓从地下出来说明地气已变），最后是物（王瓜的生长是最直观的物质性变化）。阳气从天而降，先改变了空气（声），再改变了泥土（蚯蚓），最后改变了生命（王瓜）。

为什么偏偏是这三种生物而不是其他？这或许涉及到了先民在特定地域（中原地区）的具体观察经验——这三种生物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是最容易观察到的、与季节变化最敏感对应的标志物。其他地区的先民或许会选择不同的物候标志。但月令所记录的是“标准”物候——它代表的是理想化的、普适性的标准，而不是某个特定地方的地方经验。

五、为什么先秦人如此热衷于建立“对应关系”？

贯穿本文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先秦思想家对“对应关系”的热衷——五行与五方、五色、五音、五味、五臭、五脏、五帝、五神……一切都要建立对应。

这种热衷的根源是什么？

一种解释是实用性的：对应关系提供了一种预测和控制的手段。如果我知道夏天属火、其色赤、其味苦，那么我就可以在夏天通过穿赤色衣服、吃苦味食物来与天道保持同步——这给了人一种控制感，一种面对浩瀚宇宙时不至于完全无助的安全感。

另一种解释是审美性的：对应关系构建了一个极其精美的宇宙图景。当你看到天上的大火星、地上的赤色花朵、耳中的徵音、口中的苦味、鼻中的焦味——一切都指向同一个主题（火），你会感到一种深层的美感——一种万物和谐统一的美感。这种美感或许不亚于对应关系的实用价值。

第三种解释是存在论的：先民真诚地相信，宇宙就是这样运行的。对应关系不是人发明的，而是人发现的。正如一位现代物理学家相信自然定律是客观存在的一样，先秦思想家也相信五行对应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的工作不是“创造”这些对应，而是“揭示”这些对应。

这三种解释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可能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侧重。但无论如何，这种对“对应关系”的热衷塑造了先秦宇宙论的基本面貌，也使得立夏这个节气获得了远超其天文学意义的丰富内涵。

第十五章 《山海经》中的南方世界：立夏的神话地理

一、南方的神灵与异兽

《山海经》对南方世界的描绘充满了奇幻色彩。南方是火德之方，也是一切与夏天相关的神话力量的汇集之地。

《海外南经》描绘了南方的诸多奇异国度和神灵：“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结匈国在其西南，其为人结匈。”“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

“羽民国”的人身上长着羽毛——这与月令中夏天的代表动物类别“羽虫”（鸟类）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南方的人长出了羽毛，就像南方的季节产出了飞鸟。这种“人与环境同质化”的想象，反映了先民一个深层的信念：居住在某个方位的生命体会渐渐变得与那个方位的五行属性相似。南方属火、配夏、其虫为羽——因此南方的人也长出了“羽”。

《大荒南经》中有更多关于南方世界的描写。那里有“不死之国”——南方的强烈生命力甚至可以战胜死亡。这与夏天“生长”的主题相呼应——在最蓬勃的生长力面前，连死亡都可以被克服。

二、火山与火泉：大地之火

《山海经》中还记载了南方的火山和火泉。《海内经》提到：“炎火之山……其山四方，不可以上。”炎火之山四面陡峭，无法攀登。这座燃烧着的山，是大地之火最壮观的体现。

为什么南方会有火山？在先民的理解中，这不是地质构造的巧合，而是五行规律的必然——南方属火，所以南方的大地也应当蕴含着着火的力量。火不仅在天上（太阳），不仅在人间（灶火），也在地下（火山、火泉）。天上、地下、人间的火，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德体系。

这种“火无处不在”的认知，深化了我们对立夏的理解。立夏不仅仅是天上的太阳变得更热了，更是天地之间所有层面的火力都在增强——天上的阳光更加强烈，地下的地温在上升（蚯蚓因此出土），人体内的阳气在增长——一切都在向着“火”的方向变化。

三、扶桑与十日：太阳神话与夏之光

前文提到了十日浴于扶桑的神话。在《山海经》的宇宙地理中，扶桑位于东方的大海中，是太阳升起之处。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海外东经》）

扶桑——一棵生长在热水（汤谷）中的巨树，十个太阳以它为栖息之所。这个意象将太阳与树木联系在一起——太阳是天上的火，树木是地上的木，而木生火。扶桑作为太阳的栖息之树，正是“木生火”这一五行关系的神话表达。

立夏时节，太阳的力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虽然还没有到夏至的极致）。在神话的想象中，这意味着那个“居上枝”的太阳在天空中走得更高了、停留得更久了。夏天的白昼之所以漫长，就是因为太阳在天空中的“行程”更长了。

这种将天文现象神话化的思维方式，是上古先民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他们不是不知道太阳每天都会升起和落下（这是最基本的经验事实），但他们需要一个“故事”来解释这个事实——为什么太阳会升起？因为它从扶桑的树枝上出发。为什么夏天的太阳特别高、特别久？因为它走得更远了。

这些“故事”在现代看来或许是幼稚的，但在先民的精神世界中，它们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它们使得无意义的自然现象变成了有意义的宇宙叙事，使得人在面对浩瀚的天地时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因为天地之间的一切都被编织进了一个有序的、可理解的故事之中。

第十六章 立夏与音乐：蕤宾之律与天地之声

一、十二律与十二月

先秦的音律体系将一个八度音程分为十二个半音，称为十二律：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这十二律与十二个月一一对应。孟夏之月对应的律是“仲吕”。“仲”是中间的意思，“吕”是阴律。孟夏之月虽然是阳气旺盛的时节，但其对应的律却是“阴律”——这是一个有趣的矛盾。

为什么最“阳”的季节对应着“阴律”？一种解释是：十二律的阴阳配属与月份的阴阳状态形成了“互补”关系——阳月配阴律，阴月配阳律。这种互补确保了每个月份中阴阳的平衡，避免了“纯阳”或“纯阴”的极端状态。

另一种解释是：这恰恰体现了“阳极阴生”的道理——在阳气最盛的时候，阴的力量已经开始以某种隐微的方式存在了。仲吕之律的“阴”性质，正是这种隐微的阴的音律表达。

《吕氏春秋·仲夏纪》记载：“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宾。”仲夏之月的音是徵音，律中蕤宾。蕤宾对应的是五月（仲夏），而非四月（孟夏）。但孟夏的律“仲吕”与仲夏的律“蕤宾”都属于夏天的音律范畴，它们共同构成了夏天的“声景”。

二、为什么音乐与季节有关？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问的问题。在现代人的认知中，音乐是人造的艺术，与自然界的季节变化没有内在的关联。但先秦思想家却坚信音律与季节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对应关系。

《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音乐是天地和谐的体现。天地的和谐有多种表现形式——四季的有序更替是一种，万物的各得其所是一种，而音乐的和谐悦耳也是一种。在先民的感知中，这些不同的“和谐”遵循着同一个法则，因此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映射。

更具体地说，先民可能通过“候气”的方法发现了音律与季节之间的某种经验性联系。所谓“候气”，是将不同长度的律管（竹管或铜管）插入地下或放置在密封的室内，观察在不同的节气到来时，哪根律管中会有气流涌出（灰飞管动）。据说，在特定的节气，与之对应的律管会因为地气的变化而产生共振。虽然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值得商榷，但它反映了先民试图通过实验来验证音律与季节对应关系的努力。

无论“候气”的具体细节如何，先民所建立的音律-季节对应体系在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意味着：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而人在不同的季节应当聆听和演奏不同的音乐。立夏时节，应当演奏徵音为主的音乐——那种激昂高亢的旋律，与夏天的热烈和蓬勃相呼应。

三、音乐作为天人沟通的媒介

在先秦的仪式体系中，音乐不仅是娱乐，更是天人沟通的媒介。孔子先生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人的修养始于诗，成于礼，完成于乐。音乐是修养的最高阶段——在音乐中，人达到了与天地和谐共振的境界。

在迎夏仪式中，音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月令没有详细描述迎夏仪式中具体演奏什么音乐，但根据先秦音乐理论的原则，迎夏之乐应当以徵调为主、用与仲吕或蕤宾相关的律来演奏——这样的音乐既能表达人对夏天的欢迎，又能与夏天的天地之气形成共振，从而促进天人之间的和谐。

这种通过音乐来促进天人和谐的理念，在先秦思想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它意味着音乐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宇宙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手段之一。好的音乐可以调和天地之气、安定人心；坏的音乐（如靡靡之音）则会扰乱天地之气、败坏人心。

第十七章 立夏与水：看似矛盾的共生

一、夏天为什么多雨？

夏天属火，按照五行的逻辑，火克金、水克火——那么夏天应当是最干燥的季节才对。但事实上，中原地区的夏天恰恰是降水最多的季节。这是怎么回事？

先秦思想家对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周易·乾卦·彖传》说：“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在乾卦（纯阳）的时段，恰恰有“云行雨施”的现象。这说明在先秦的理解中，阳气的充盈并不排斥雨水的降临——相反，正是阳气的强大力量使得水蒸气上升为云，然后化为雨降落。

在这种理解中，夏天的雨不是“水克火”的表现，而是“火生水”（或更准确地说，火的力量催化了水的循环）的结果。阳气蒸腾地面的水分，上升为云，云积聚到一定程度就化为雨降落——这个过程需要强大的阳气（火）来驱动。夏天之所以多雨，恰恰是因为夏天的火力够强，能够蒸腾大量的水分。

《管子·水地》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生命的根源。即使在火德当令的夏天，水也不会缺席——因为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而夏天恰恰是生命最旺盛的季节。

二、雷雨与夏之威

夏天的雨往往伴随着雷声。在先秦文化中，雷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周易》中有专门的“震”卦（☳），其象为雷。《说卦传》说：“帝出乎震。”帝（宇宙的主宰力量）从震卦出发——震卦对应的是东方和春天，代表着阳气开始萌动。但雷并不局限于春天——夏天的雷更加频繁和猛烈。

夏天的雷雨，在先秦思想家看来，是阴阳之气剧烈交汇的结果。当天上的阳气和地上蒸腾的水气（阴）在高空相遇时，就会产生剧烈的碰撞——这就是雷电。雷电既是“火”的表现（闪电的光和热），也是“水”的表现（暴雨的倾泻），它是火与水在天空中的一场壮观的“会面”。

《庄子·外物》记载了一段与雷电相关的寓言，虽然不直接讨论季节，但它对自然力量的敬畏态度是先秦思想的一个普遍特征。先民对夏天雷雨的态度，既有敬畏（雷被视为天的威怒），也有感恩（雨水滋润了万物）——这种复杂的情感态度，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力量既依赖又畏惧的真实心理。

结语：立夏之门——走入天人交融的世界

一、回顾：我们学到了什么？

通过以上十七章的详细分析，我们从多个角度——天文、历法、物候、神话、哲学、政治、伦理、音乐、农业、养生——深入探讨了"立夏"这个节气。

我们学到了：立夏不是一个孤立的时间节点，而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它涉及到天上星宿的移位、地上万物的变化、人间政令的调整、身心状态的转换、音律的更替、祭祀的进行——一切都在这个时刻发生着协调一致的转变。

我们学到了：先秦思想家对立夏的理解远远超出了"天气变热了"的层面。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宇宙性的能量转换——从木到火、从生到长、从柔和到热烈——这种转换贯穿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层面。

我们学到了：儒家和道家虽然对立夏的态度有所不同（儒家强调主动顺应，道家强调自然无为），但两家的核心关切是一致的——如何让人与天道保持和谐？如何在四季的更替中实现生命的圆满？

我们还学到了：上古神话中的炎帝、祝融、大火星、扶桑、十日等意象，为立夏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文化背景。这些神话不仅仅是"故事"，更是先民对宇宙秩序的一种诗意表达。

二、立夏之门：一个隐喻

如果将立夏比作一道门，那么这道门的这一边是春天——柔和、含蓄、充满希望但尚不确定的春天。而门的那一边是夏天——热烈、明朗、充沛而有力的夏天。

跨过这道门，意味着从"可能"走向"确定"——春天播下的种子"可能"会生长，但到了夏天，它们"确定"在生长了。春天萌发的善端"可能"会壮大，但到了夏天，它们"确定"要壮大了——如果你愿意"扩而充之"的话。

跨过这道门，也意味着从"轻"走向"重"——春天的生命是轻盈的、飘忽的、像嫩芽一样脆弱的。夏天的生命则是沉实的、茂密的、像大树一样有力的。这种从"轻"到"重"的转变，正是"大"的过程——从微小走向壮大，从萌芽走向成熟。

跨过这道门，还意味着从"内"走向"外"——春天的能量是向内积蓄的，而夏天的能量是向外释放的。立夏之后，一切都在向外展开——花朵完全绽放，枝叶完全伸展，虫鸟完全活跃，生命力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

三、最后的追问：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理解立夏？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理解立夏？

因为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已经与自然的节奏严重脱节了。我们不再根据太阳的位置来安排作息，不再根据物候的变化来决定农事，不再通过季节的更替来调整身心状态。我们生活在恒温恒湿的室内，在人工照明的环境中，在与自然隔绝的城市里——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天地之间的一部分。

重新理解立夏，不是要回到先秦时代的生活方式（那既不可能也不可取），而是要重新建立与自然之间的联结。当立夏到来的时候，试着走出房间，感受一下空气中的温度变化，倾听一下虫鸣的节奏，观察一下草木的生长状态。在这些简单的感受中，你或许能够触摸到先民所体验过的那种与天地合一的感觉——虽然只是一瞬间，但那一瞬间足以提醒你：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你是天地之间亿万生命中的一个，你与花草树木、虫鱼鸟兽共享着同一股生生不息的宇宙之气。

孔子先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不说话。但它通过四季的更替，不断地在向我们传递着信息。立夏，就是它的一次"发言"——一次关于生长、关于热烈、关于光明的发言。

问题是：我们，还在听吗？

全文完

原文链接：[https://profound.fate-](https://profound.fate-craft.com/blog/%E4%BA%8C%E5%8D%81%E5%9B%9B%E4%BA%8C%E5%8D%81%E5%9B%9B%E8%8A%82%E6%B0%94%E4%B9%8B%E7%AB%8B%E5%A4%8F%E6%B7%B1%E5%85%A4)

[craft.com/blog/%E4%BA%8C%E5%8D%81%E5%9B%9B%E4%BA%8C%E5%8D%81%E5%9B%9B%E8%8A%82%E6%B0%94%E4%B9%8B%E7%AB%8B%E5%A4%8F%E6%B7%B1%E5%85%A4](https://profound.fate-craft.com/blog/%E4%BA%8C%E5%8D%81%E5%9B%9B%E4%BA%8C%E5%8D%81%E5%9B%9B%E8%8A%82%E6%B0%94%E4%B9%8B%E7%AB%8B%E5%A4%8F%E6%B7%B1%E5%85%A4)

衍象坊 · 先秦文化研究 | profound.fate-craft.com